

茶座

总第三十四辑 2014 第三辑

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

历史学家茶座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王学典 或许我们正置身于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前夜

胡学常 毛泽东的一篇“大文章”与两个“小人物”的被利用

孟祥才 两则追忆

高世瑜 小高庄的“社会史”——一个知青记忆中的河北农村

黄朴民 真相难觅：《赵氏孤儿》背后的历史重构

姜克实 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者数考

陈仲丹 日本历史上的混浴之风

肖舟 历史上被掩秘的“1942”



主 编：王兆成

执行主编：王学典

学术助理：郭震旦 绍 樱

编委会：

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
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
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
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
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历史学家茶座. 第34辑 / 王兆成主编

—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14.12

ISBN 978-7-209-08796-4

I . ①历 ... II . ①王 ... III . ①史学—丛刊 IV . ① K107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260545 号

责任编辑 王海涛 刘 晨

封面设计 李海峰

版式设计 谢润菊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编辑部电话 0531-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-82098021

邮局邮发代号 24-50

投稿邮箱：lishixuejiachazuo@126.com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

16 开本（169×232 毫米）11 印张 176 千字
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18.00 元

（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电话：0539-2925888）

或许我们正置身于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前夜

王学典

2014年6月25日,“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学术研讨会暨文史哲英文版首发式”在青岛举行。会上,一位在美国学习、工作多年的学报主编在发言中指出:文化只有传统与现代之别,没有东方西方之分;在美国的课堂上,不会有人从地域角度谈文化。这一发言,引起许多与会者的共鸣。

许多人之所以对这一看法产生共鸣,可能是因为,这一发言,事实上再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老问题:文化,究竟是古今问题还是东西问题?究竟是时间问题还是空间问题?究竟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还是不同文明间如何相处的问题?

这一问题,也再次把我们带回上世纪“八十年代”。因为上世纪“八十年代”正是以这些问题为“中心问题”的年代。我由此产生一种预感,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或许正呼之欲出,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,我们或许正置身于这场大论战的前夜。

当下,引发一场文化大论战的基本条件看来也已经具备。

文化上的东西古今问题,仿佛是一个跷跷板:任何一端的分量加重必然会引发另一端的“反攻倒算”或“疯狂报复”。袁世凯倡导“尊孔读经”之于“五四运动”,蒋介石的“新生活运动”之于三十年代中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,“文革”的所谓“封建复辟”之于“八十年代”的“新启蒙”,都是典型的例证。近来倡导的对“传统文化”特别是对“儒学”的尊崇以及近十年来各地蜂拥而起的“读经班”,难道不会引起另一端的强劲反弹?反弹是必然的,只是尚未找到恰当的机缘而已。

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再一次进入“八十年代”的“问题”之中。但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,还有“八十年代”的那种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”的使命感吗?还有“胸怀世界,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精神吗?还有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”的雄心与抱负吗?还有批判锋芒、怀疑一切的理念和难以抑制的反叛意识吗?

鲁迅说:五四之后,有人高升,有人退隐,有人彷徨,有人堕落。“八十年代”结束之后,难道不也是这样吗?两代启蒙知识分子尚且如此,我们怎么能苛求年轻一代呢?

或许,我们需要重新踏访那个已经消逝的“八十年代”,然后再作新的抉择。

目 录

卷 首 语

- 003 王学典 或许我们正置身于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前夜

国史新论

- 007 胡学常 毛泽东的一篇“大文章”与两个“小人物”的被利用

人物春秋

- 016 张家康 李德的中国长征纪事

- 028 徐迅雷 陈仪悲歌

学坛述往

- 039 孟祥才 两则追忆

另眼读史

- 046 金满楼 侵华三调：明治年代的日本军国之路

旧案重审

- 058 姜克实 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数考

- 075 胡新民 什么是陈诚的持久抗战论？

史家情思

- 084 高世瑜 小高庄的“社会史”——一个知青记忆中的河北农村
099 韩博韬 曹丕的文人才性与帝王命运

史论沙龙

- 108 黄朴民 真相难觅：《赵氏孤儿》背后的历史重构
119 张承宗 《桃花源记》对唐诗的影响
127 丁 哲 张旭鹏 普遍史的回归与大历史的兴起
133 袁 昊 历史重述与宏大叙事

历史三昧

- 137 廖保平 史札二则
145 陈仲丹 日本历史上的混浴之风

公私档案

- 155 肖 舟 历史上被掩秘的“1942”
167 [俄]伊·尼·奥列金娜 作 曹特金 译
我的童年生活——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和解国后

封面用图：带着在台儿庄战死者遗骨行军的日军福荣部队。（《支那事变画报》第二十六辑，大阪每日新闻社、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5月1日，第24—25页。）

主 编：王兆成

执行主编：王学典

学术助理：郭震旦 绍 樱

编委会：

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
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
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
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
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历史学家茶座. 第34辑 / 王兆成主编

—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2014.12

ISBN 978-7-209-08796-4

I. ①历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史学—丛刊 IV. ①K107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260545号

责任编辑 王海涛 刘 晨

封面设计 李海峰

版式设计 谢润荊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编辑部电话 0531-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-82098021

邮局邮发代号 24-50

投稿信箱：lishixuejiachazuo@126.com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

16开本（169×232毫米）11印张 176千字

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18.00元

（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电话：0539-2925888）

或许我们正置身于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前夜

王学典

2014年6月25日，“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学术研讨会暨文史哲英文版首发式”在青岛举行。会上，一位在美国学习、工作多年的学报主编在发言中指出：文化只有传统与现代之别，没有东方西方之分；在美国的课堂上，不会有人从地域角度谈文化。这一发言，引起许多与会者的共鸣。

许多人之所以对这一看法产生共鸣，可能是因为，这一发言，事实上再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老问题：文化，究竟是古今问题还是东西问题？究竟是时间问题还是空间问题？究竟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还是不同文明间如何相处的问题？

这一问题，也再次把我们带回上世纪“八十年代”。因为上世纪“八十年代”正是以这些问题为“中心问题”的年代。我由此产生一种预感，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或许正呼之欲出，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我们或许正置身于这场大论战的前夜。

当下，引发一场文化大论战的基本条件看来也已经具备。

文化上的东西古今问题，仿佛是一个跷跷板：任何一端的分量加重必然会引发另一端的“反攻倒算”或“疯狂报复”。袁世凯倡导“尊孔读经”之于“五四运动”，蒋介石的“新生活运动”之于三十年代中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，“文革”的所谓“封建复辟”之于“八十年代”的“新启蒙”，都是典型的例证。近来倡导的对“传统文化”特别是对“儒学”的尊崇以及近十年来各地蜂拥而起的“读经班”，难道不会引起另一端的强劲反弹？反弹是必然的，只是尚未找到恰当的机缘而已。

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再一次进入“八十年代”的“问题”之中。但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，还有“八十年代”的那种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”的使命感吗？还有“胸怀世界，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精神吗？还有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”的雄心与抱负吗？还有批判锋芒、怀疑一切的理念和难以抑制的反叛意识吗？

鲁迅说：五四之后，有人高升，有人退隐，有人彷徨，有人堕落。“八十年代”结束之后，难道不也是这样吗？两代启蒙知识分子尚且如此，我们怎么能苛求年轻一代呢？

或许，我们需要重新踏访那个已经消逝的“八十年代”，然后再作新的抉择。

目录

卷首语

- 003 王学典 或许我们正置身于一场新的文化大论战前夜

国史新论

- 007 胡学常 毛泽东的一篇“大文章”与两个“小人物”的被利用

人物春秋

- 016 张家康 李德的中国长征纪事

- 028 徐迅雷 陈仪悲歌

学坛述往

- 039 孟祥才 两则追忆

另眼读史

- 046 金满楼 侵华三调：明治年代的日本军国之路

旧案重审

- 058 姜克实 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者数考

- 075 胡新民 什么是陈诚的持久抗战论？

史家情思

- 084 高世瑜 小高庄的“社会史”——一个知青记忆中的河北农村
099 韩博韬 曹丕的文人才性与帝王命运

史论沙龙

- 108 黄朴民 真相难觅：《赵氏孤儿》背后的历史重构
119 张承宗 《桃花源记》对唐诗的影响
127 丁 哲 张旭鹏 普遍史的回归与大历史的兴起
133 袁 昊 历史重述与宏大叙事

历史三昧

- 137 廖保平 史札二则
145 陈仲丹 日本历史上的混浴之风

公私档案

- 155 肖 舟 历史上被掩秘的“1942”
167 [俄]伊·尼·奥列金娜 作 曹特金 译
我的童年生活——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和解围后

封面用图：带着在台儿庄战死者遗骨行军的日军福荣部队。（《支那事变画报》第二十六辑，大阪每日新闻社、东京日日新闻社1938年5月1日，第24—25页。）



- 
 国家图书馆
 北京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《说文解字》 | 段玉裁 | 200 |
| 《说文解字注》 | 段玉裁 | 200 |
| 《说文解字》 | 李承祜 | 911 |
| 《说文解字》 | 丁 | 121 |
| 《说文解字》 | 李 | 121 |

毛泽东的一篇“大文章”与两个“小人物”的被利用

胡学常

围绕两个“小人物”致函《文艺报》之事是否存在，近期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进行了一场颇有看头的论争。先是王学典先生爆料“揭秘”（《“红楼梦研究”大批判缘起揭秘——两个“小人物”致函〈文艺报〉的事是否存在？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11年9月21日），率先发难，继而“小人物”李希凡先生出离愤怒，奋起驳难（《李希凡驳〈“红楼梦研究”大批判缘起揭秘〉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12年4月11日），再有王学典先生再度发力，高调喊话：“拿证据来！”（《“拿证据来”——敬答李希凡先生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12年4月18日）。又有徐庆全先生自局外悄然跟进，大抖其料（《两个“小人物”的信在哪里？——兼驳李希凡先生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12年4月25日），“抖料”之结果，还是对李希凡先生相当不利的。最后，李希凡先生老当益壮，愈战愈勇，怀着必胜之信念，“再驳王学典”（《再驳王学典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12年5月9日）。

果然非常“有戏”。我等看客“围观”之下，时而会有“被围观”的冲动，“技痒”难耐。笔者“过瘾”之余，确真也有了些许“被围观”的冲动。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。

“探询信”问题，大抵已做成“铁案”

致《文艺报》的“探询信”，不过是近六十年前“小人物事件”中的一

件小事，什么样的小事件，能受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“抖料”？依笔者“围观”之私见，经王学典先生首次“揭秘”，“秘”就“揭”得几无“剩义”，结论也就大抵可下了。徐庆全先生“跟进”，那是“锦上添花”。至于李希凡先生，其两次高调出场，不过是让我辈看客一睹当事人或“历史活物”之反应，情形仿佛是“过堂”，“被告”过了一下“堂”，形式走全了，程序“正义”了，没有什么遗憾了。

王学典先生的证据和结论已经很强大了。一封“探询信”，原件已不可能找到，有人说存在这样一封信，有人说不存在，欲证明其有无，实有极高的难度。王先生独辟蹊径，从当时几种相关文献入手，通过细心的罗列和分析，发现理应现身于这些文献的“探询信”，根本就找不见一丝踪影。按照毛的《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》，《文艺报》的“问题”主要有二：“容忍”乃至“投降”“资产阶级唯心论”，以及“阻拦‘小人物’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”。那么，对于《文艺报》的批判或自我批判，理所当然地要针对毛所指示的两个“问题”。而且，如果写给《文艺报》的“探询信”确实存在，正可坐实毛对《文艺报》“阻拦‘小人物’”的指控。如此“猛料”，“围剿”《文艺报》时，诸色人等甚至包括毛泽东自己，竟然弃之不理，委实不可思议。结论只能是，“探询信”根本不存在，至少是当时的调查并未发现它的存在。仅凭这番实证功夫，王学典先生大抵可将此案做成“铁案”。所以，尽管材料有限，王先生仍然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“大胆假设”：李希凡先生并没有给《文艺报》写过那封“被置之不理”的信这一事实，在1954年10月16日毛信发出之后不久，很可能即已调查清楚，当时已无疑问了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李希凡先生在答辩文中居然“自摆乌龙”，爆料说，1954年11月初，在《文艺报》召开的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上，《文艺报》唐因等四人曾约他单独谈话，表示没有看到“探询信”。而且，《文艺报》一直坚信“探询信”不存在，也一直耿耿在怀，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，那几位又提出信的问题，要他公开答复。李先生的主动“献料”，令王先生喜不自胜：“李先生无意中反倒为笔者提供了坚实的证据，使拙文的核心假设得到了证实。”事情还不算完，随后“跟进”的徐庆全先生，又抖出了更

多的好料，既有毛派人调查《光明日报》之“文学遗产”编辑部的“外证”，也有张僖先生回忆江青派人调查《文艺报》的“本证”，这样，王学典先生的那个“核心假设”，也就获得了更为坚实的坐实。

李希凡先生只是一不小心摆了“乌龙”，其本意是要不无亢奋地答而辩之。如今八十多岁的“大人物”，一如五十多年前的“小人物”，依然是情绪化，意识形态化，总之是非学术化。王学典先生却有很好的学术风度，只是喊话说：“拿证据来！”估计李先生会颇不以为然，说，我说了那么多话，怎么能没有证据呢？比如，当年《文艺报》唐因等四人的“单独谈话”，不是证据是什么？推想李先生举此证据之初衷，大约是想证明：当年自己早就声明过“确实写过信”，而且“绝没有告状的意思”。可是，当年说过“确实写过信”，根本不能证明那封信确实存在。也就是说，证据和结论之间没有逻辑联系。王学典先生罗列出四种相关的重要文献，以证“探询信”之不存在，李希凡先生则举了更多的证据予以驳斥。不幸得很，或许是一辈子操练“以论带史”已成习惯，李先生的驳斥显得逻辑混乱，仿佛是故意地胡搅蛮缠，用李先生自己的话说，就是在“拧麻花”。王学典先生在问：《文艺报》先是对“探询信”“置之不理”，继而在“编者按”中表露出巨大保留态度，此是两度表明了对“小人物”的冷漠与轻蔑，而且前者更形“恶劣”。既然如此，署名“袁水拍”的《质问〈文艺报〉编者》一文，何以在“编者按”上大做文章，而对那封毛看得很重的信则“置之不理”？李先生答辩说：《质问〈文艺报〉编者》矛头所向是《文艺报》的“编者按”，那封信“不是关注的重点”，“当然没必要对此揪住不放”。那封信何以“不是关注的重点”，李先生自说自话，并无一句话在答辩王先生的问题。

李先生进而辩称：“1954年《文艺报》的人坚称没看到我的信，并不能因此蛮不讲理地否定我写过‘探询信’，更无法否认《文艺报》存在‘不可以批评俞平伯’的立场问题！”徐庆全先生文章透露了张僖先生的回忆：“调查组对《文艺报》的人挨个调查，被调查的人一直否认看到过这封信；翻箱倒柜地查《文艺报》档案，也毫无踪迹。”按彼时的规矩，来稿来信，编辑部大约是要登记在册的，既然“翻箱倒柜”地查过档案，也对编辑部人员“挨

个调查”一遍，那么，基本上可以认定“探询信”之不存在。可以推测，当时各方，《文艺报》及文艺界领导人，甚至包括毛，在调查完结之后，都是认可这一结论的。李先生除了坚称写过“探询信”，并无像样的证据可以举出，情急之下，不得不引进《文艺报》的“立场问题”，以转移视线，混淆问题。他引了白盾文稿被拒一事，也引了一篇赞扬俞平伯的评价文章，力证《文艺报》的立场“表露无遗”而且“无法抵赖”。最后，李先生下断语说：

在白盾文章被退稿的事披露后，再争论我的探寻信有无，已失去意义。《文艺报》给白的退稿信已表明“不可以批评俞平伯”的立场，即使我们的文章寄去，也是同样下场；即使看到我的信，也会“置之不理”！

争辩之焦点是“探询信”之有无，而与《文艺报》“‘不可以批评俞平伯’的立场问题”无关。白盾是否被退稿是一回事，“探询信”之有无是另外一回事；对“探询信”“置之不理”是一回事，信之存在与否是另外一回事。李先生即使有更充足的理由证明《文艺报》立场确有問題，也对证明那封信之存在没有丝毫的帮助。

看来，“探询信”大抵可证其“无”了。行文至此，笔者也不妨附加一点小“料”。来自于黎之的回忆。黎之新任职于中宣部文艺处，时在1954年10月初，正值《文艺报》转载两个“小人物”文章之后，毛的《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》发出之前。据黎之回忆，毛的信发出后，他对信中所涉及的有些事实，当时即有不同的看法。比如，“李、蓝曾给《文艺报》写信，该报置之不理一事，我听到冯雪峰几次否认此事”（黎之：《文坛风云录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0页）。黎之还回忆说，《质问〈文艺报〉编者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后，中宣部紧密跟进，林默涵召集文艺处的“秀才”起草批判文章，黎之的一篇被看中，由林默涵在该文上作了很大修改，题为《〈文艺报〉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》，刊于11月10日的《人民日报》。黎之文专批《文艺报》的“资产阶级作风”，诸如骄傲自满情绪，缺乏自我批评精神；诸如盛气凌人，大行粗暴打击。也像王学典先生所述的几种文献

一样，黎之文中见不到“探询信”的踪影，它虽也提及《文艺报》“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容忍”，而对“新生力量”加以“阻拦和压制”，却并未在此为“探询信”狠狠地记上一笔（同上，第11—12页），这同样令人不好理解。

“探询信”问题不是最重要的，必须看到毛在做“大文章”

李希凡先生反复强调，“探询信”之存在与否并不重要。它不是毛“关注的重点”，“当然没必要对此揪住不放”；便是“小人物”他俩，对它也看得十分轻淡，“从未把那信看得如王学典夸张得那么重要，总念叨它也不是我们的风格”。李先生大约是想以“探询信”之不重要，来混淆乃至消解王学典先生“揪住不放”的信之有无的问题。至于李先生心目中，“探询信”问题的真实分量若何，尚不得而知。

但是，王学典先生对于“探询信”问题，无疑看得很重。个中因由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主要是关乎毛的那封措辞严厉的信。从此信看，引发毛震怒的，首要的即是“小人物”写了“探询信”而被“置之不理”。由此极易作这样的推想：如“探询信”并不存在，情形或许会有很大不同。王学典先生似乎如此推想过，所以，“揭秘”文中，王先生认定，如确能证明“探询信”不存在，同时也能证实《文史哲》主动约稿在先，那么，“两个‘小人物’文章的象征意义恐怕也就相应减弱了”。

“揭秘”文的最后，王学典先生又写道：

李希凡、蓝翎二位先生的文章，在当时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批判的工具而已。从当时的情势看，批判胡适已箭在弦上，即使《文史哲》不发表《关于〈红楼梦简论〉及其他》，胡适批判也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，甚至，一定会有其他“小人物”来担任李、蓝二先生的角色。他们就这样被时代所选择，成为弄潮儿。

王先生文章终于又深翻了一层，直达事件之本质。由是推测王先生之心思，他大抵如此认为：作为一件史实，尤其是关涉毛泽东批判信所指史实之真伪，